

研究紀要

鳳林地區日治與戰後 客家移民之比較研究初探

廖經庭*

摘要

綜觀台灣客家區域研究，過去學界往往未將研究視野置於台灣東部客家，為了平衡客家區域的調查研究，故筆者選擇花蓮客家重鎮——鳳林地區為觀察區域，希望從研究中瞭解台灣島內客家族群的區域特色。

研究發現鳳林地區今日的族群組合主要是源自於日治與戰後兩期的移民潮。為何這些客家人選擇移居鳳林發展呢？本研究發現其原因可歸納為天然災害、戰亂、就業機會、求學與等四項因素。這些移民者多藉由「社會資本」，獲得資訊、住宿與信任的協助，而順利進入當地社會，進而產生在地化之現象。

日治與戰後的移民有頗大程度的差異。日治移民多舉家遷移，且大多數透過較早移民鳳林的親友介紹而來，而且日治時期客家移民對住所的選擇也較為有限。戰後客家人主要有來自中國

*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e-mail：dragonflyliao@yahoo.com.tw。本文初稿發表於「第三屆客家學術研討會」（2004年10月9日，美和技術學院），業已經過修改。首先感謝兩位匿名審查教授給予本文諸多寶貴建議與鼓勵。此外，本文之完成需感謝張翰璧教授，若無張教授的細心指導，本文勢必難以順利完成。也感謝徐雨薇小姐及廖經泰先生協助潤飾文字，在此一併獻上最深且由衷的謝忱。
收稿日期：96/01/21 接受刊登日期：96/09/27

大陸、台灣西部與台灣東部等地，而舉家遷移的情況不若日治時期般常見，且其所擔任的職業也較為多元。戰後日本人戰敗離開台灣，遂有戰後客家移民進入日治時期官設移民村的生活空間。再從在地化過程的角度而言，日治與戰後移民者在工作職業、客家意像、社團活動與原鄉聯繫模式等四方面均有差異。

關鍵字：鳳林、客家、移民、在地化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akka Immigrants under Japanese Governance and Post-war Periods in FongLin

Ching-Ting Liao

Abstract

After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Hakka area studies in Taiwan, a gap has been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re is no research on Hakka society in Eastern Taiwan.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of Hakka areas, this paper chooses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FongLin's Hakka society in Easter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e paper discover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Hakka Groups in FongLin came from an immigrant influx under Japanese governance and post-war periods. Why did the Hakka choose to migrate to FongL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reasons for immigration to FongLin are natural disasters,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employment, and attending school. The emigrants entered the local society through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information, lodgment, and the assistance of trust.

Key Words: FongLin, Hakka, immigrant, localization

一、前言

鳳林古稱「馬里勿」，相傳蠻荒時代，林木蒼鬱，叢林密佈，山峰壯麗，木蘭纏繞巨木，天然形成，如鳳凰展翅，聚集如林。漢人入墾，觀其形象，遂易名為「鳳林」，而名符合其景也。

～《鳳林史蹟考》（賴東明 n. d）

上述文字是《鳳林史蹟考》一書對於「鳳林」一名由來的說明，文句中描繪鳳林早期自然環境與漢人移墾初期的概略景象，使我們對於鳳林早期歷史有一初步印象。

相較台灣其他地方而言，東部地區的開發較晚，早期「蕃害」嚴重，加上交通不便，鮮有漢人到此處開墾。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楨向同治皇帝上〈台地後山請開舊禁摺〉：「際此開山伊始，招墾方興，臣等揆度時勢，合無仰懇天恩，將一切舊禁盡與開豁，以廣招徠，俾無瞻顧。」（沈葆楨 1997：13）清廷政府從之，清廷遂開始對東台灣採取的「開山撫番」政策，積極主動開發後山¹地區，以北路、中路、南路三路並進的方式通達後山，隔年（1875）更在東台灣成立第一個行政區卑南廳，這意味著國家體制正式進入東台灣（李國祈 1975：5）。此時，漢人勢力才逐步進入台灣東部，不過清廷政府對東部地區的控制尚不嚴密，因此台灣東部地區仍屬於政令不易到達之處，清治時期也

¹ 「後山」乃指今日花蓮與台東兩縣管轄之範圍。關於「後山」的研究，康培德教授曾從地理空間的想像來討論清代「後山」的論述與想像，他認為：「『後山』此一地理名詞的產生，主要來自對『前山』的對應。純就字義來看，『後山』顯然是在『山之後』；然而，在清代文獻的書寫中，『後山』具有更為複雜的語意及內涵。」請參見（康培德 2004：299-318）。

少有漢人進入東部拓墾。

日治時期是台灣東部開展的重要時期，台灣總督府依恃嚴密的「殖民統治」政策，在台灣開始調查戶口、整理地權等工作，²並開始對台灣東部進行有計畫的開發，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及台東開拓株式會社兩大會社開始進入台灣東部推展移民事業，³推行樟腦、甘蔗、林業等作物的栽培，這些作物的栽培均需要大量勞力，遂使得漢人大量進入台灣東部地區，⁴而鳳林地區也是在此背景之下，大批客家移民移入此地。

戰後台灣東部的整體環境與日治不同，戰後初期或因第二次大戰戰亂，或因經濟因素等，迫使客家人從中國大陸、台灣西部與台灣東部遷移進入鳳林，此時也為鳳林帶來另一波移民潮。

日治與戰後東部客家移民來源頗有不同。日本政府對東部移民進行管制政策，客家人遷移東部的過程中，有中間人或仲介者幫助客家人移民，且單身遷移的客家人佔多數。戰後東部的客家移民以舉家移居類型較多，而戰後東部的移民情形又可分為初期及民國五十年代後這兩個階段。

初期台灣東部的移民人口仍持續增加，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民

² 明治三十一年（1898）後藤新平出任台灣民政長官後，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展開各項調查事業，例如土地調查、人口調查與林野調查等，使日本政府更清楚地掌握了台灣人口動態及林野資源。請參見（鄭政誠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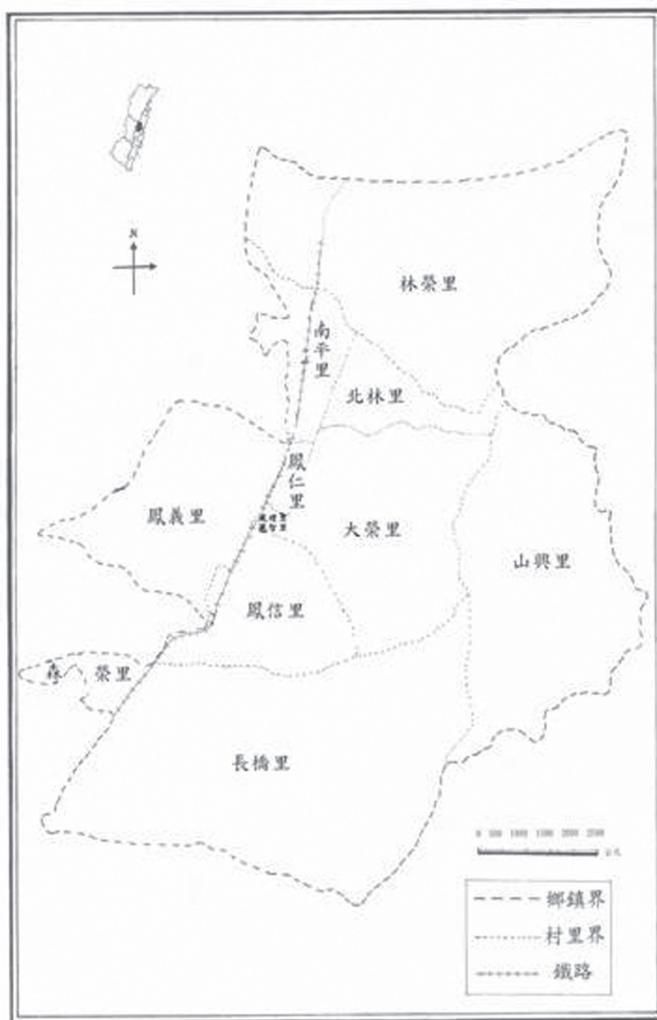
³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以花蓮地區為經營區域，台東開拓株式會社則以台東地區為開發範圍，但花東縱谷中段的玉里庄、大庄區，卻未見有日本官方或兩大日資會社所經營的大規模土地開發事業，林聖欽認為這乃是因為日人對縱谷中段開發少有著力，本島人積極經營地域土地的結果。請參見（林聖欽 1998：239-277）。

⁴ 梶原通好在〈東部台灣の農業を論ず〉一文提出台灣東部的四項特點：「第一、海路交通不便，物資出入搬運有困難。第二，人民過半數是蕃人。第三，人口稀薄，一般勞力缺乏。第四，土地開發有賴官私營移民。」由此可見日治時期勞力不足的現象。請參見（梶原通好 1924：91）。

國三十八、三十九年（1949、1950）國民政府一連串土地改革政策，像是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這些政策釋放大量原來在日治時代屬於殖民政府或是會社、糖場的土地，因而助長了不少的移民風潮。

民國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以後，東部的人口開始呈現負成長，這主要是因為台灣西部開始工業化，原本東部的農業生產便隨著這個時代的潮流而沒落下來。樟腦的開採幾乎停止，蔗糖的產量與價格年年下跌，民國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的香茅業也像是曇花一現般地在帶給東部短暫的繁榮後消失的無影無蹤（馮建彰 2000：221-222）。鳳林地區的戰後客家移民也如同上述之遷移情形所言，基本上都是戰後初期便移入鳳林發展。

鳳林地區經過日治與戰後兩次移民風潮後，已使得該地成為一個客家族群為主體的區域，如今鳳林地區也成為花蓮中段最重要的客家鄉鎮。由於遷移時期的不同，使得客家人遷移的方式、管道均有差異；再者，客家人至東部後其在地化之過程也有不同，故本文嘗試從文獻資料中找尋鳳林客家人遷移的足跡，配合口述訪談的研究方法將日治與戰後兩類移民者進行研究，希冀比較此二時期移民者的差異，使吾人對台灣東部客家鄉鎮的區域特色有更透徹的認識與了解。



鳳林鎮地名分布圖

圖1 鳳林鎮地名分布圖⁵

⁵ 地圖重繪自（潘文富等 2005：64）。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文的重點在於客家移民與在地化之歷程，將使用「文獻蒐集法」及「深度訪談法」等研究方法進行調查研究。

1、文獻蒐集法

蒐集基本文獻資料為本研究之調查研究起點，盡力蒐集鳳林暨花蓮地區的文史資料將有助於勾勒出鳳林地區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有助於本文口述訪談工作之進行。筆者將運用日本政府統計資料、《花蓮縣志》、《鳳林史蹟考》與《花蓮縣統計要覽》等資料，從這些檔案資料與人口統計數據中，勾勒日治與戰後鳳林地區移民之情況。

2、口述訪談法

本文以遷移時間為分類依據，分為日治移民（1895-1945）與戰後移民（1945-迄今）兩種類型，各挑選九位（共十八位）受訪者，進行口述訪談，為顧及訪問資料的正確與完備性，筆者徵求受訪者同意後錄音，謄寫逐字稿後以書面方式呈現，希冀從口述訪談資料中，比較日治與戰後兩類移民類型的特色與差異。

在個案的選樣上，本文選擇「滾雪球」（snowballing）模式，這種研究方法為由一位受訪者介紹下一個受訪人，依序調查，這是觀察研究和社區研究者經常使用的一種選樣方式（Bailey, Kenneth 1993：95）。滾雪球模式的另一個特性為：「當調查母體的個體資訊不充分時，常採用研究方法。」（袁方主編 2002：210）筆者進入鳳林地區田野現場之時，對此研究區

域居民的移民特性不甚明確清楚，採用此選樣方式詢問受訪者：「您是否認識其他也清楚鳳林移民歷史的人」，將有助於拓展訪談內容的廣度與深度。

本文挑選的十八位受訪者中有七位退休教師，其中這七位退休教師中又有四位曾擔任校長一職，另有五位退休公務人員、三位自由業、一位公務人員、一位醫師、一位命理師。滾雪球模式選樣時最大的問題便在於：「最後仍有許多個體無法找到，還有些個體因某些因素被提供者故意漏掉不提」（袁方主編 2002：210），為避免滾雪球模式選樣的缺失，因此筆者盡可能找尋的鳳林的區域特色，選擇七位退休教師的原因在於鳳林素有「校長之鄉」的美名，⁶這些受訪者擔任教職的原因或許與當時的移民背景有關，後經過實際口述訪談發現，本文挑選之兩位受訪者分別與日治時期開發鳳林地區的重要人物鄧阿秀、徐秀春及林泉安有血緣關係，對當時的移民情況能有相當程度的認識。

地方遷移的歷史過程並非人人清楚，平日有參與地方事務或鑽研地方文史工作者對當地的遷移歷史及文化才有基本的認識及瞭解，因此本文便依循上述之條件尋找合適受訪者，例如受訪者廖先生（個案R1）擔任校長時，曾協助台灣省文獻會進行耆老口述訪談，⁷退休之後他也成立一個文史工作團體，對鳳林地區的族群及移民情況頗為瞭解。基本上，本文受訪者均經過挑選，透過

⁶ 鳳林鎮長林廷光認為：「校長是鳳林鎮的集體記憶及人文精神」，一萬多人的小鎮當過校長者超過八十人，為何鳳林地區能出現這麼多位校長呢？這與強烈的脫離貧困動機、良好的教育風氣以及張七郎先生成立鳳林中學等因素有關。請參見：李明軒，2005，〈校長夢工廠：一萬人的小鎮八十位好校長〉。《天下雜誌》324：310-314。

⁷ 此口述訪談後經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請參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1999）。

這十八位受訪者對鳳林地區族群歷史嫻熟的認識與瞭解，將有助於本文勾勒鳳林客家族群的移民情形，以及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的異同之處。

本文也將透過日治時期的人口統計量化資料介紹客家人遷移鳳林的數量，從量化統計資料中說明饒永昌與林泉安等人從西部原鄉招募同鄉至鳳林之情形，因此將口述訪談與人口統計量化資料相互配合，將有助於本文更加釐清客家移民入墾鳳林的情況。

（二）類型分類

本文研究對象為居住於鳳林地區的客家人，依移居鳳林時間進行分類，共有兩種移民類型，各訪問九人，共訪問十八位受訪者（見附錄），說明如下：

1、日治移民類型

指1895年至1945年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遷移至鳳林的客家人，惟遷移鳳林的第一代長者多已凋零，故日治移民類型訪問者都是移居鳳林第二代。其中幾位受訪者甚至也是鳳林地區的重要家族的成員之一，例如「會社」附近的林家（林泉安）與「車路背」陳家（徐秀春），筆者均曾訪問其後代族人。日治移民類型共訪問九位，在個案標記上以英文大寫字母J1-J9表示。

2、戰後移民類型

指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才移居鳳林的客家人。戰後移民類型也共訪問九位，在個案標記上以英文大寫字母R1-R9表示。其中本類型又可次分為三種：

（1）原居中國大陸，後移入鳳林：1945-1949年大陸政情混

亂，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造成強大威脅，因此廣東一帶的一些客家人，便逃往台灣，後來到鳳林定居生活，是鳳林地區相當特殊的一群客家人。

- (2) 原居東部，後移入鳳林：戰後花蓮市遇到空襲或經濟生活條件的改變，使得東部境內的客家人開始在東部境內移動，有一批人便來到鳳林境內定居。
- (3) 原居西部，後移入鳳林：此一類型較少見。戰後從西部遷移至鳳林發展的客家人不多，主因仍是戰後東部經濟條件改變，使得東部的工作機會開始減少，日治鳳林地區客家人主要從事的工作，樟腦因化合物的出現，使得國際價格大跌；糖廠也因甘蔗價錢不好，蔗園漸漸廢耕；稻作近年來也開始休耕，這些都是戰後鳳林無法吸引大量人口進入的原因，主因還是缺乏工作機會。

三、鳳林地區的客家移民

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的調查指出，鳳林鎮53.3%的居民自認為台灣客家人，其比例之高為花蓮眾鄉鎮市之首，鳳林可說是花蓮客家族群的主要聚集之處（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4：A-1）。鳳林為花蓮中段的行政區，日治時期花蓮縣稱為花蓮港廳，而統轄花蓮中部的行政區稱為鳳林區，便是座落於今日的鳳林鎮。

筆者將運用《花蓮縣志》、日本官方人口統計資料、《花蓮縣統計要覽》與口述訪談等資料進行論述，依清治（1684-1895）、日治（1895-1945）、戰後（1945-2000）三個時期探討鳳林客家族群的移民情形。

（一）清治時期

清代缺乏東部客家人口的統計，無法探知當時實際的客家人口與分布，不過從現存的資料中，仍可依稀了解當時客家移居東部的情況與分布。

首次遷移至東部的客家人應是清咸豐三年（1853）沈私有、陳唐、羅江利等人，他們率領二十幾位族人，越過古道，進駐璞石閣（今玉里），開荒墾地，並築土城防止其他族群的侵擾，由於城內居民都是客家人，「客人城」之名因此被叫響起來（花蓮縣文獻委員會編 1958：6）。

清同治十三年（1872）沈葆楨命羅大春、吳光亮、袁聞拆等開通北、中、南三條通往後山的陸路，隨後，沈葆楨又奏請清廷開放山禁與海禁，自此通往後山的道路更為暢通，前往後山開發的漢人遂日益增加。北路以蘭陽平原為起點，到新城鄉和花蓮市附近定居，這批移民應該以閩南族群為主。中路則以總兵吳光亮的廣東募兵為主，穿越中央山脈以後，在花蓮中部定居生活，但卻不幸發生激烈的番漢衝突，引發「大港口事件」，⁸在宴會後集體屠殺部落青壯勇士，導致部落逐漸退出花東縱谷地區，而客家族群便在此時代背景之下開始移入東部地區。南路則由台東北上，這批移民從高雄、屏東等地逐步遷徙到花蓮、台東等地，其成員包含客家與閩南族群（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 2003：8）。

除了私人前往後山拓墾人數大量增加外，清廷後來也藉由官方力量招募漢人至台灣東部開墾。清光緒三年（1877），巡撫丁

⁸ 大港口事件的爆發原因乃是吳光亮駐軍過度役使當地民力使然。對此一事件更詳細的描述，請參見（李宜憲 2005：5-36）。

日昌直接從中國廣東汕頭，招募到2,000多名潮州地方居民，用官輪運載來台，並將其中的800多位撥交予吳光亮，分配至大港口和卑南等地開墾，而後這項開墾計畫雖然停辦，但對台灣東部社會也產生影響，如光緒十四年（1888）大庄反清事件，⁹即是當年從汕頭招募來台的劉添旺等人所發起（劉還月 1999：95-96）。

除了上述文獻記載之外，尚有許多客家人以小規模移民方式，私越禁界到後山發展，只是數量並不多。清代相關文獻提供客家人移居東部的一些線索，但缺乏詳盡之史料記載，故吾人難以清楚勾勒於清代時客家人移民東部實際人數，僅能勾勒出基本之輪廓。

（二）日治時代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在台推行多次的戶口調查，每隔五年即進行全台各地的人口普查工作。從日本政府調查的統計資料（圖二）中，吾人可見日治時代花蓮地區客家人口數為：大正四年（1915）花蓮地區只有3,383位客家人；大正九年（1920）增加約2,000人，達5,314人；大正十四年（1925）增加的比率變動不大，達7,814人；大正十四年以後，移居花蓮客家人快速增加，昭和五年（1930）破萬已達12,732人；昭和五年至昭和十年（1935）又是另一波移民潮，昭和十年達21,333人；昭和十年以後移民客家人口雖有增加，較前期為少但仍達25,450人。因此從上述的統計資料中，吾人可歸納出昭和五年至昭和十年為日治時

⁹ 大庄事件起光緒十三年（1887）因為劉添旺的岳母遭受徵稅官員逼辱，劉添旺憤而糾眾戕殺官員，而後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派艦砲攻擊起事群眾而告平定，事後滿清部隊實施報復、株連之舉，許多客家人因而受到牽連。關於大庄事件的詳盡原委，請參見（潘繼道 2001：79-110；黃學堂 2003：4-13）。

期客家人移居東部的最高峰時期。

日治時期客家人大量移居花蓮地區有其歷史背景。日本統治台灣初期隨即整理地權將未有所有權的原野地收歸官有，並開始積極開發山林原野資源，例如樟腦、甘蔗、稻米等。為經營上述作物，日本政府遂開始與日本財團合作，將官有林野地放領（賣渡）或放租（賃渡）予這些財團，例如賀田金三郎所屬之賀田組，以及隨後重組而成之台東拓殖株式會社與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等，於東台灣均佔有大量的可耕地面積（馮建彰 2000：212-213）。水田、旱田與林地增加促成人力資源的需求，客家人便開始大量進入花蓮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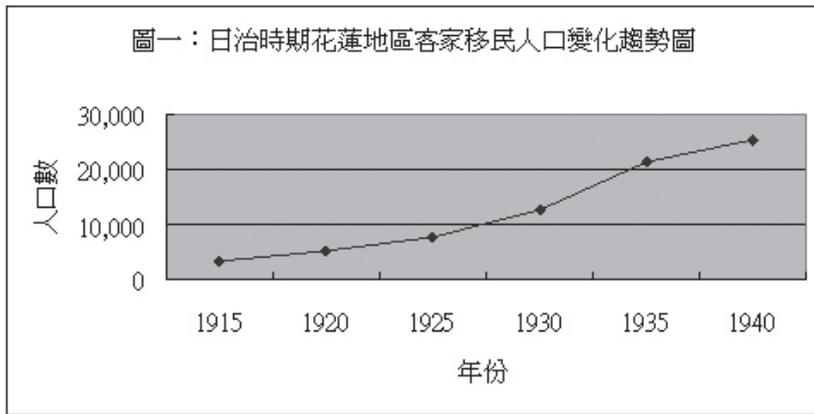


圖2 日治時期花蓮地區客家移民人口變化趨勢圖¹⁰

接著再觀察日治時期花蓮地區外來移民之原籍。從表1中可見1920年代以前，台北州遷移花蓮地區的比率最高，達44.62%，

¹⁰ 資料來源：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1915），表1，頁2。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集計原表（1920），表1，頁2。國勢調查結果表（1925、1930、1935）台灣省第7次人口普查結果表（1940），表1，頁16。轉引參見（劉還月 1999：101）。

其次是新竹州；1930年新竹州迎頭趕上台北州，均達41%左右；1940年新竹州成為花蓮地區外來移民的最大「出輸地」，近半（51.16%）的人從新竹州遷移而來，台北州減少為32.36%。由此可見，1930年是花蓮地區外來移民人口原籍改變的重要年代，1930年以前台北州位居首位，1930年以後卻是新竹州獨居鰲頭。

日治時期新竹州的住民，約95%左右為客家人，而台北州幾乎全是閩南人（劉還月 1999：102-103）。因此，1940年新竹地區的客家人已成為花蓮地區最主要的移民，此時客家人遷移至花蓮地區發展人數遠高於閩南人遷移花蓮人數。

表1 花蓮地區外來移民人口原籍比例

年代	1920	1930	1940
台北州	44.62%	41.92%	32.36%
新竹州	39.00%	41.74%	51.16%
台中州	3.58%	4.67%	8.42%
台南州	2.50%	1.56%	1.66%
高雄州	5.95%	4.69%	3.36%
台東州	4.34%	5.42%	1.99%
澎湖廳	無資料	0.21%	0.3%

資料來源：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集計原表（1920），表17，頁550-558。

國勢調查結果表（1930）州廳，花蓮港，表30，頁126。

台灣省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表（1940），表7，頁30-31。

轉引參見（劉還月 1999：103。）

在鳳林的情況方面，1930年日本政府曾進行國勢調查，完成《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集計原表—州廳之部》一書，孟祥瀚教授將此資料整理成表2，從表2可知，來自台北州者，高達58.5%之比例以花蓮港支廳為主要移入地區，鳳林支廳與研海支廳分別僅佔24.3%及7.3%；來自新竹州者，則有高達48.7%的移民以鳳林支廳為主要移入地區，較南的玉里支廳也高達32%，僅有17%的新

竹州移民選擇花蓮港支廳為落腳處。由此可見，在移民的空間分布上似乎已形成某種趨勢：北部花蓮港支廳一帶以閩南族群佔多數，往南客家族群的比例則逐漸增加，亦即客籍人口之分布，主要以鳳林支廳與玉里支廳為主（孟祥瀚 2002：139）。

表2 昭和5年（1930）花蓮港廳來自台北與新竹台籍人口分布比例表

	台北市出生者	新竹州出生者
總數	100%	100%
花蓮港支廳	58.4%	17.0%
鳳林支廳	24.3%	48.7%
玉里支廳	7.3%	32.0%
研海支廳	9.7%	2.3%

資料來源：參見（孟祥瀚 2002：139）

在日治時期鳳林地區住民的國籍組成及移民組籍分布情況中。首先，吾人可從表3看出此時台灣人在鳳林地區所佔的人口比例最高，台灣人約佔本地人口九成以上，日本人及外國人的比例微乎其微。其次，出生自鳳林支廳的台灣人有15,934人，約佔本地人口數65%左右，另有35%之比例則屬移民而來，由此可見昭和五年（1930）這段時期，鳳林地區人口增加除了自然增加（出生死亡）外，社會增加（遷移）也是造成此時鳳林人口急速增加的主因。

移居鳳林支廳者又以新竹州及台北市為大宗，其中來自新竹州者有5,226人，約佔鳳林支廳人口21%左右，多數為客家人；來自台北市者有2,617人，約佔鳳林支廳人口10%左右。

表3 昭和5年（1930）鳳林支廳人口出生地表

	合計	日本人	台灣人	外國人
總數	27,666	2,136	24,669	861
內地出生	1,392	1,391	1	0
鳳林支廳出生	16,719	692	15,934	93
台北州	2,634	13	2,617	4
新竹州	5,235	1	5,226	8
台中州	305	4	301	0
台南州	139	13	126	0
高雄州	213	8	205	0
台東廳	246	6	240	0
澎湖廳	12	0	12	0
朝鮮出生	5	5	0	0
樺太出生	0	0	0	0
外國出生	763	3	4	756
航海中出生	0	0	0	0
不詳	2	0	2	0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5年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篇》，頁126-127。轉引參見（孟祥瀚 2002：140）

昭和五年（1930）鳳林支廳管轄之地較今日鳳林鎮行政區寬廣，今日轄屬鳳林鎮之鳳林、林田村（南平里）、萬里橋村（長橋里）、六階鼻（山興里），以及今日轄屬光復鄉的馬太鞍與太巴壟（富田）等地均屬鳳林之廳之管轄範圍。從表四可發現鳳林是鳳林地區漢人人數最多的地區，共計2,195人，其中來自廣東籍者1,636人，來自福建籍者只達559人，70%以上的鳳林居民是廣東籍漢人。林田村也有1,103位廣東籍漢人，福建籍僅642人，60%以上為廣東籍漢人。萬里橋村計有384位廣東籍漢人，福建籍漢人263位，廣東籍漢人將近佔萬里橋村人口60%以上。六階鼻廣東籍漢人僅100人，福建籍漢人為132人，廣東籍漢人約佔六階鼻人口40%左右。由此可見，1930年代左右鳳林客家人主要集中於

鳳林、林田村與萬里橋村三地，即今日之鳳林市區、南平里與長橋里等地。¹¹

樟腦、蔗糖¹²與林業等工作機會是日治時期鳳林人口急速增加的主因。日治時移民鳳林的客家人大多從台灣西部遷徙而來，其中又以祖籍新竹、苗栗兩地遷入者最多。鳳林開發史上有一位饒永昌先生，光緒六年（1880）十一月十日饒永昌生於新竹州竹南郡頭分庄，自幼便學習漢書漢字，他擔任過鳳林區長、新竹廳陸軍補給廠通譯、東部臺灣花蓮港賀田組通譯、開拓事業、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取締役、東臺灣新聞社監查役、東臺灣無盡會社監查役、鳳林信用組合理事、鳳林簡易水道組合長、臺灣獎學會評議員等職務（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興南新聞社調查部編 1985：96。）。除此之外，饒永昌更曾擔任鳳林區長（1916-1937）、鳳林庄長（1937-1940）及鳳林街長（1940-1942），與日本人的關係良好，後來他取得鳳林地區樟腦的開採權，他在鳳林一帶山區進行製作樟腦的工作，日治時期當地勞力十分匱乏，故他個人及其下屬曾返回家鄉招募親友移民鳳林發展，居住於車路背¹³的陳家、徐家都是在饒永昌的下屬鄧阿秀的親友，在車路背一帶居住的陳家與徐家都有血緣關係。受訪

¹¹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篇》的統計依漢人、平埔族、高山族等族群劃分，其中漢人未按照客家與閩南「族群」作區分，僅以「祖籍」區分福建籍與廣東籍，台灣客家族群多來自廣東地區，閩南族群多來自福建地區（當然有部分例外），唯在缺乏族群來源詳細統計數據的情況之下，本文暫且將祖籍為廣東者視為客家人，福建籍者視為閩南人。

¹² 花蓮地區糖業歷經傳統糖廊、賀田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台灣糖業公司等時期之演變。有關花蓮糖業的發展，可參見（鍾書豪，2003）。

¹³ 「車路背」即為今日鳳義里鳳鳴一路前段。本地位於鳳林火車站的後方，早年鳳林鎮並無街道名，故習稱鳳林鐵路西邊的地方為「車路背」，意指鳳林車站的後面，當地居民以徐姓及陳姓為多。請參見（潘文富等 2005：71-72。）

者（J1、J3、J5、J6、R1、R2）提到饒永昌曾多次返回頭份招徠客家鄉親至鳳林發展，故早期鳳林地區有「小頭份」之稱。

日治時期另一項重要的產業為糖業，而鳳林糖業移民與林泉安有關。「苦力頭」¹⁴ 林泉安為當時負責鳳林甘蔗原料區的主要人物，林泉安年輕之時從新竹竹東來到鳳林發展，一開始也是從事製作樟腦工作，後來才進入「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花蓮港製糖所大和工場」服務，「大和工場」在鳳林成立甘蔗原料區，¹⁵ 當地人將甘蔗原料區稱為「會社」¹⁶，現位於鳳林鎮客家文物館附近，林泉安在鳳林發展有成後返回家鄉招募親友，糖廠提供「工寮」供員工居住，¹⁷ 當地居民以林姓、鍾姓與劉姓最多，受訪個案林主任（J8）指出，林、鍾、劉三姓都是林泉安招募而來且都具有親戚關係，其中鍾姓乃是林泉安母親娘家的親人。

除了私人招募之外，透過政府力量進行開發工作也吸引大量客家人進入鳳林地區。林田山林場設立後，林務事業蒸蒸日上，

¹⁴ 鳳林客家人把日治時期在甘蔗原料區工作的員工稱為「苦力」，而負責管理這些工作人員的主管即稱為「苦力頭」。

¹⁵ 大和工場在玉里、瑞穗、富源、光復、富田、萬榮、鳳林、豐田、志學等九個地區設立甘蔗原料區。

¹⁶ 「會社」範圍涵蓋今日鳳仁里一至三鄰，其正式的稱呼為：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鳳林原料事務所。由於當時需要很多工人植蔗以提供製糖原料，大家便在事務所附近搭建工寮，故民間習慣上稱之曰「會社」。請參見（潘文富等 2005：71）。

¹⁷ 蔗糖是日治時期鳳林地區重要的經濟作物，而台灣東部的蔗糖生產與西部的蔗糖生產方式不同，馮建彰指出兩者的差異為：「東部的蔗糖生產與『農場』（plantation）體系以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它並不完全像西部的蔗糖生產那樣，由糖場與蔗農製作，有很大部分是由會社（糖場）以農場的方式與佃農製作，甚至在農場內直接使用普羅階級的雇工（臨時工或零工）來為糖場生產蔗糖，這種情況在東部現在還存在著，這些人現今仍做著糖場的零工，住在糖場的土地上，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林泉安邀集親友前來鳳林從事蔗糖生產，提供住所供親友居住，其運作模式便如同馮建彰所言之情形。請參見（馮建彰 2000：250-251）。

林務工作需大量人口，林田山備有宿舍、電影院（中山堂）等完備的設施，因此吸引西部居民移民到林田山擔任林場工人，其中也包含為數不少的客家人。

上述樟腦、甘蔗與林業三大產業，在日治時期蓬勃發展，為鳳林地區提供不少的工作機會，吸引許多西部客家人遷徙至鳳林地區，日治時期可說是鳳林地區人口社會增加數量最大的一段時期。

表4 昭和5年（1930）鳳林支廳鳳林區漢人人口之數量與比例表

	漢人 總數	福建籍		廣東籍		其他	平埔族	高山族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鳳林	2,195	559	25.5%	1,636	74.5%	0	2	448
林田村	1,745	642	36.8%	1,103	63.2%	0	28	129
萬里橋村	647	263	40.6%	384	59.4%	0	12	51
六階鼻	232	132	56.9%	100	43.1%	0	39	127
馬太鞍	1,105	737	66.7%	368	33.3%	0	31	2,086
太巴塢	656	345	52.6%	311	47.4%	0	16	2,625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5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表—花蓮港廳》，頁16—21。轉引參見（孟祥瀚 2002：142）。

日治時期移民類型大多透過親友介紹而來，而這些招徠西部親友來鳳林者便是馮建彰所言之「仲介者」或「中間人」。筆者從口述訪談所得資料中發現日治時期鳳林地區的移民「仲介者」與今日所謂的外籍勞工「仲介者」有所不同，日治時期鳳林地區的「仲介者」與「被仲介者」多具有地緣或血緣關係，而兩者的連帶關係較強，因此除金錢利益外更具存在人際互動關係，若移民者暫無棲身之處，「仲介者」也經常提供住宿、飲食的協助。

（三）戰後時期

日治時期鳳林地區招 大量勞動人口，其中又以1940年代達到最高峰，全區最高人數達25,000人。國民政府時期統治台灣後，鳳林地區人口開始減少，從表5可發現，民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946-1947）間人口大幅減少，僅剩13,169人，隨後逐年回升，1950年代又突破20,000人大關。1970年代以後，鳳林地區人口開始外流，近年鳳林地區人口僅剩萬餘人，年輕人口多到外地謀生工作，留在鳳林地區大多為老年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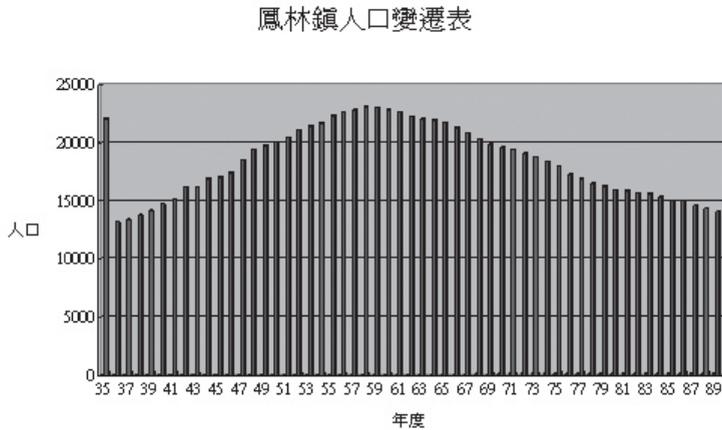
戰後鳳林地區缺乏工作機會，因此相較於日治時期，戰後遷入鳳林的客家人並並不多見，其中受戰禍影響而遷入鳳林地區的外省客家人¹⁸。鳳林的外省客是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這一段時間抵達鳳林發展的客家人，而且都是來自於廣東省揭陽縣河婆鎮。

戰後鳳林客家人居住範圍也得以擴展。戰後初期日本官營移民村的日本人離開台灣，鳳林林田移民村¹⁹之土地與房舍因此大量釋放出來，於是客家人開始進入大榮里（昔大榮一村、二村）與北林里（昔大榮三村），戰後客家移民開始往日治官營移民村的大榮等地移動，此為戰後客家移民的特色之一。

¹⁸ 「外省客家人」乃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才來到台灣的客家人。「外省客家人」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彭芊琪 2005a、2005b：103-113）。

¹⁹ 林田移民村為日本政府在花蓮設置的第三個移民村，大正三年（1914）設立林田村，共分為南岡、中野、北林三聚落。花蓮地區移民村之相關研究，請參見（鍾淑敏 1986：74-84；張家菁 1996；黃蘭翔 1998：213-238；張素玢 2001）。

表5 戰後鳳林地區人口數量變遷表



資料來源：花蓮縣統計要覽（http://www.hlhg.gov.tw/static/book/index_book.htm）（2007年4月11日閱讀）

表6 鳳林地區日治與戰後移民類型的比較

日治	戰後
單身而來	舉家遷移
多從事教職	職業較多樣
有仲介者角色	無仲介介紹
主要從西部來	從東部、西部、大陸來
住在漢人區	可住在官營移民村

從上述分析中，吾人可知日治時期鳳林地區實屬「人口移入期」，此時有大批客家人移入鳳林地區，主因乃是日治時期本地提供大量工作機會，例如樟腦、甘蔗、稻作等都需要大量勞力，因此便產生「仲介者」返回西部原鄉招徠同鄉親友，以提供供不應求的勞力需求。

戰後時期屬於「人口移出期」，戰後樟腦、甘蔗與稻作活動

都不似日治時期有良好的發展，此三種農業活動都漸漸趨於停頓，加上鳳林地區缺乏工業產業，故工作機會不多，因許多位受訪者都表示：「鳳林地區沒有什麼工作，頂多就是當老師，不然就是到公家單位上班，根本沒有工廠可以讓你工作，因此近年來年輕人都跑到西部找工作，年輕人留在鳳林的不多。」（個案 J1、J2、J3、J5、J7、R2、R4、R8、R9）。由此可見，台灣工業化與都市化不但未為鳳林帶來發展，反而使得鳳林地區人口外流，影響了鳳林地區的發展。

四、類型比較：遷移方式

臺灣本係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廣東人居住，一半生番併熟番；

生番住在山林內，專殺人頭帶入山，帶入山中食粟酒，食酒唱歌喜歡歡。

～《渡台悲歌》（黃榮洛 1989：24-25）

這是客家先民流傳下來的一首民謠，清楚描繪清初時期客家族群渡海來台披荊斬棘、蕁路藍縷開創生活的情景。早期客家族群移居台灣東部也如同上述情景般，但為了找到適切的安居環境，他們仍不畏懼艱辛而至此生活。

客家人從清治開始移墾東部地區，但移墾人數十分有限，日治時期始有大批客家人移居鳳林地區，筆者將從口述訪談資料中探究客家族群移居鳳林之原因及移民時所必須的社會資本，藉以釐清鳳林客家移民之過程及其背後因素。

（一）移民原因

在人口遷移理論中「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是相當重要的理論，簡言之，推拉理論認為遷移發生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push force)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交互作用而成。遷移者之所以要離開原住地，可能因為原住地的排斥力所致，排斥力的種類很多，而且因人而異，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排斥力有不一樣的感受(廖正宏 1985: 94)。造成客家人移入鳳林地區的推力為何？筆者從口述訪問中，發現客家人大量移入鳳林之因可歸納為：

1、天然災害

日治時期桃竹苗一帶的客家人生活困苦，加上昭和十年(1935)四月廿一日新竹、苗栗、台中一帶發生大地震，²⁰昭和十年(1935)年大地震可說是日治時期台灣最嚴重的一次地震，聚集於桃竹苗近山一帶客家人飽受生命財產的威脅，家計實在難以維持，遂有大批客家人從西部前往當時仍處荒涼的花東一帶拓墾發展，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派間的花東縱谷內形成許多客家聚落，主要聚集於吉安、壽豐、鳳林、光復、瑞穗、玉里、富里等地(劉還月 2000: 321)，尤其以鳳林地區客家族群的聚集比例最高。

某些客家人在西部原有小康程度的生活，但卻因天災摧毀家園，家園受到極大的破壞，一片狼籍的情況之下，這些客家人只好走上移民鳳林之路。例如鄧先生(個案J1)的父親原本居住於苗栗頭份，但昭和十年(1935)苗栗發生大地震，家園傾毀無法

²⁰ 災後台灣總督府採取一連串的救護與興建措施，這些資料後來經由南天書局出版成書，可參見(台灣總督府 1999)。

生存，無奈之下只好前來鳳林找尋發展機會：

當時西部有大地震，沒有辦法生活過去就過來了，山都變了，地也變了。我伯父先過來，他寫信回來說「地震以後生活也困難，過來東部吧！」，我就全家過來。我伯父一家人已經先在這裡了，先過來好幾年了。我跟我爸、叔叔、哥哥、妹妹等六、七人過來。我爸爸來到這邊後從事務農工作，伯父也是務農工作。我伯父在這，馬上就介紹我爸工作做了，就有田可耕，那時候就跟別人租田。（個案J1）

在親友的協助之下，鄧先生一家得以在天災發生財產損失之後另覓生存之處。

2、戰亂

鳳林地區也有一群相當特殊的客家族群－外省客家人，這群客家人是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這一段期間，從大陸揭陽遷來鳳林發展的客家人，住在鳳林的外省客有陳、韓、黃、彭、劉、蔡、張、鍾等姓，這些外省客都有地緣關係，在大陸時多是鄰居。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期間，大陸局勢混亂，為了躲避戰禍，有些大陸客家人便東渡台灣避難，例如祖籍廣東省揭陽縣的劉先生（個案R3）是來台第二代，他指出他父親乃因戰亂而遷移來台：

我父親民國三十七年有鑒於大陸已經開始有動亂的跡象，動亂的跡象以後，為了生活，因為變成那個時候都是隨便徵兵，……結果三徵四徵，大家看他們不對勁了，真正戰爭起來大家也受不了，所以慢慢他們就有一個念頭，像我爸爸那個時候聽說，因為國民政府已經開始撤退，要到台灣，他就

率先說：「我去看一看」，他就跟著國軍的「國民輪」，他那個是載運這些轉戰台灣的人，他就搭那個船過來。（個案R3）

因戰亂而移居鳳林的客家人不僅劉先生（個案R3）的家族，基本上戰後移入鳳林地區的外省客家人幾乎都是因國共戰亂而離開家鄉，本文共訪問三位戰後移入鳳林的外省客家人，另兩位外省客家人受訪者劉先生（個案R5）與張先生（個案R6）均是相同的遷移背景—戰亂因素。

3、就業機會

某些個案不願僅僅在家鄉從事出賣勞力的農耕工作，他們認為留在家鄉可能一輩子都沒出息，故有出外打拼的念頭，為了遠大理想與抱負，他們甘願離鄉背井找尋自己理想的工作機會。劉先生（個案J3）便提及他父親遷移東部的原因乃是東部能實現他父親從事機械相關行業的工作，因此他便選擇離鄉背井至鳳林開業：

他（按：受訪者父親）有這個執照（按：駕駛大汽車執照）但是沒有去做，後來去做腳踏車，他自己去當學徒，他在日本人的店裡當學徒。因為在關西的時候作農，聽說小時後讀書就很喜歡機械的東西，所以他就一直想對機器方面發展，不要再做農，所以他才會跑出來，所以就到東部來，因為我一個姑母她先來，姑媽先來，所以就帶他來，當時他才十六歲。（個案J3）

除了腳踏車店外，早期鳳林地區的醫療資源匱乏，故某些個案也來到鳳林地區開設診所，一位在鳳林開業的醫師林先生（個

案R2) 便指出：

大概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我們從屏東那個時候在空軍醫院就退伍下來，退下來我父親是希望我開業，……所以找適合開業的地方，我們這裡的親戚我姑媽、太太的叔叔，他講這個地方醫療資源不太夠，所以那時候三十年前醫療資源不太夠，那個時候病人還很多，需要醫生還有空間，所以我們就過來了。(個案R2)

日治時期隨著東部樟腦、蔗糖與林務事業的發展，使得鳳林地區也逐步開發，也因此造就許多工作機會；相較之下，台灣西部開發較早，部分行業早已達飽和狀態，故離開西部原鄉前往鳳林尋找工作機會不失為謀求發展的良策。

4、求學

早年花蓮地區教育資源匱乏，初中極少，鳳林僅有鳳林初級中學，早期有不錯的升學率，故也有個案為讓子女接受更好教育而遷入鳳林生活，例如廖先生(個案R1)原住在瑞穗鄉富源一帶，但因富源沒有初中，只好搬到鳳林繼續升學：

搬到鳳林是因為我讀書的關係，因為那個時候這裡有一個初中，我已經上初中了，上初中因為這裡有一個初中，富源沒有初中，應該是民國三十五年。我二十二年生！十三歲吧！搬到鳳林。(個案R1)

(二) 遷移的社會資本

除了原住地的推力外，遷入地又提供哪些有利移民的拉力

呢？移民者到陌生環境，其生活條件並不充分，若移民者在移入地能擁有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將可大大降低移民的風險與恐懼感，因此移民至鳳林的客家人幾乎藉由社會資本而順利進入當地社會。筆者在口述訪談過程中，發現鳳林客家移民社會資本的形式，可包含「提供訊息」、「提供住宿」與「提供信任」三項：

1、提供訊息

移民資訊的提供可分為居住地的訊息及工作機會的訊息兩類進行討論：

第一種訊息的提供為選擇居住地的訊息。當移民者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裡，若無熟識親友提供這方面的訊息，移民者可能會選到一個不適宜生活發展的地點。例如張先生（個案R6）的父親是戰後隨著國民政府遷徙來台的客家人，當時來到鳳林時人生地不熟，不知哪裡是最適宜的生活地點，竟挑到鳳林當時最落後的一個地方中心埔²¹居住：

（我們）先是住在中心埔……他（按：受訪者的父親）大陸過來在摸索地方，不知道，人家到哪裡他就跟著到哪裡，他人生地不熟，一來的時候，人家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結果住到最落後的地方，很落後的地方，然後就來蓋一個用甘蔗葉蓋了草屋。（個案R6）

在中心埔住一段時間之後，後來遇到一個颱風，中心埔損失很嚴重，後來張先生（個案R6）才又搬出中心埔，遷到鳳林國中附近居住。

第二種訊息的提供是工作機會的訊息。初到陌生地方，若有

²¹ 中心埔是日治時期鳳林一個村落的土名，即今日長橋里所轄之範圍。

充沛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將可瞭解移入地是否有適合工作之地點或職業類型，也可順利擴展工作的發展機會。鍾先生（個案R7）的父親原本在台東學金飾手藝，因友人的介紹而來到鳳林發展：

我爸爸小時後的環境不好，他十三歲就到台東學這個（金飾）手藝，……他就從屏東到台東去學手藝，在台東覺得自己還是要出來發展，他就往上找各鄉鎮這樣看，到鳳林有以前認識的人，跟他說這邊還不錯來看看，他來看了以後還可以，剛來他也是在人家那邊做師傅，做了一段時間，大概半年、一年左右，他就自己出來開業。（個案R7）

若移入地有充沛的社會資本，在他人引薦之下也可大大協助事業的順利，鍾先生（個案R7）父親所熟識的友人在鳳林生活已久，十分清楚鳳林當地的生活機能，經過觀察、衡量後發現在此地開設金銀樓業確實有利可圖，後來鍾先生也克紹箕裘繼承家業，這家金銀樓歷經四十多個年頭仍舊屹立不搖，可見得當時友人提供之資訊的確精準可靠。

2、提供住宿

移民的首要之務當然是必須要有一個安身立命之處，若無一個遮風避雨之處，往後工作也必定無發展的機會，因此移民者的社會資本也包含住宿方面的協助，例如劉先生（個案R3）的父親有豐富的命理知識，得到宗族老者的看重後，因而獲得一個安身立命的場所：

因為我父親就是學命學的人，他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但是因為他本身年輕的時候就跟著我曾祖父就學命，學命當然要

看一些三國那一些書，那時候這邊知識很不發達，聽說這邊會有一個學命學的人來，他們也蠻喜歡的，有時候大家無聊聚在一起，有時候聽聽我爸爸講講三國演義的一些故事，然後順帶就提供牛舍提供我們一個角落，因為三合院的情形都是有一邊屬於牛寮，那個牛寮就整一整，暫時在那邊住。（個案R3）

人丁居住場所安定之後，劉先生的父親才開始命理工作，後來賺錢不好意思再寄人籬下，便搬出這位老者家，遷到鳳林市區繼續從事命理工作，並兼作賣米生意。

3、提供信任

移民社會資本的第三種類型是信任。人與人在相互信任的社會中，彼此相互服務，互動的一方承擔義務或責任，另一方必定會得到報酬，人際之間具有一種互惠關係，人們相信對對方提供回報，故人們產生互相幫助、合作的現象。在移民之初，住在附近的客家人會互相幫忙協助，例如搭建住所，張先生（個案R6）便指出他們家的房子便是透過他人的協助搭建而成：

（房子）自己蓋，（別人）也會協助，以前人情味比較濃，這叫「重屋」，「重屋」就是把你拔回來的甘蔗葉一把一把網好好，你來幫我們把這個舊的換掉，叫做「重屋」，就是把舊的房子的茅草換掉。（個案R6）

上述三種類型即鳳林地區客家移民者的社會資本類型，透過社會資本幫助移民者快速進入移入地的社會網絡，適應鳳林地區的社會環境。由此可知社會資本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資本，以信任、互惠、資訊交換為其主要特色，它可增進行動者的

個人福祉與成就，社會資本在社會關係（網絡）中傳遞資源，也提供移民者順利進入鳳林地區。

五、類型比較：在地化過程

何能苛求客家保有其不變的原味？

住屋形式變了，

生活模式也變了

甚至連客家腔調都有另一番風味，

然而，

這些才是現在東部客家的實貌！

～《後山風土誌》（張振岳 1994：204）

本文關心的另一個主題為鳳林客家移民的「在地化」過程，從各地匯集而來的客家移民，進入鳳林地區後如何適應當地環境？在地化過程如何推展？各族群的關係又如何影響在地化的進行？日治與戰後移民的在地化過程又有哪些差異？鳳林地區的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遷移時間不同，其所面臨的生活環境、族群關係也各有差異，自然就造成不同的地化過程與歷史記憶。筆者將從田野觀察與口述訪談資料中，回答上述問題。

（一）工作職業

一般來說，日治移民的第一代主要從事樟腦、甘蔗原料區、林場等經濟作物的工作，例如居住於今日鳳林市區光復路與中和路的「會社」這一帶，都是日治移民鳳林的第一代，他們多從事甘蔗原料區的工作，日治時期鳳林地區糖業事業的發達與林泉安

有密切關係，透過他的引薦使得大批西部客家人來到鳳林從事栽種與採集甘蔗的工作，受訪者劉先生（個案J3）曾提到林泉安招募工人的情形：

林泉安，他也是從西部過來，……他過來的時候他是完全替糖廠工作的，就是等於糖廠要採收甘蔗、種甘蔗，都需要工人，尤其採收甘蔗需要很多工人，他帶了一批人到這裡工作，要給他們好處，並不是說我叫你做給你工資這樣就算了，他還是有很多好處給你，因為林田山農場就殺了豬，豬一條、兩條，殺了就把牠醃，醃這個鹹豬肉放在那裡，來了以後讓他們吃這個鹹豬肉，在那邊也很窮呀！如果看到有鹹豬肉大家就很高興，一直傳一直傳人就越來越多，就是這樣，他一個人就帶來不少人。（個案J3）

戰後時空環境產生變化，原需大量勞力的樟腦業與糖業開始走下坡，使得日治移民第二代的職業也隨之改變。部分日治移民第二代仍從事務農工作，但部分日治移民的第二代則擔任教職，他們受過師範教育後便到各地擔任教職，最後擔任國中、國小校長者更非少數，因此鳳林也有「校長之鄉」的美稱。²²

戰後移民的職業面臨不同的歷史環境，所從事的職業便有不同，在訪談的戰後移民個案中有從事醫生（個案R2）、銀樓（個案R7）、算命（個案R3）與兜售花生酥糖（個案R5），其職業項目較為多元。

²² 本文受訪個案林主任（個案J8）便是第一代從事糖業工作，第二代擔任教職的典型例子，他的父親從新竹東遷移此地發展，而後他就讀師範學校，畢業後便在花蓮縣境內擔任教職工作，直到民國八十九年（2000）才正式退休。

（二）客家意像

日治移民的客家意像²³可從義民廟、敬字亭與菸樓三者來說明。張振岳認為東部客家色彩的信仰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早期客家移民所帶入的三山國王，屬於中國信仰的延伸，在東部出現的惟一一座三山國王廟（台東縣長濱鄉寧埔村寧城宮）興建時，已是三山國王在台灣發展的晚期，第二階段則是台灣客家自發信仰時期，也就是義民爺信仰時期，這階段的移民大部分是日治時期才簽入東部的，當時義民爺的信仰已經發展成熟，足以取代沒落的三山國王，所以第二階段移民代入的清一色都是義民爺。²⁴ 鳳林地區日治移民者多從台灣西部遷移而來，尤其以桃竹苗為大宗，因此他們也把桃竹苗當時最興盛的客家文化義民信仰帶來東部，例如壽天宮右殿供奉義民爺，長橋里的義民廟內以義民爺為主祀神，姚誠更確切指出義民信仰與當地客家族群的關係：「義民信仰出現在花蓮境內最大的客家庄—鳳林，更凸顯了『義民爺』是花蓮地區客家移民守護神的區域意涵。」（姚誠 1999：159）由此可知日治移民擺脫中國原鄉的情懷，而以台灣西部做為東部客家的原鄉（張振岳 1994：203），義民信仰也因此成為日治移民的客家意像。

²³ 意象（images）乃指存於人們腦中一幅與現實世界情境相類比的心理圖像，客家意像是一種移情的族群想像，認為某些文化特質、生活習慣是屬於客家族群的。過去已有學者專文討論「客家意像」，請參見（林彥亨 2003；姜如珮 2004；王雯君 2005：117-156；張維安、王雯君 2005：43-76）。

²⁴ 三山國王是廣東潮州地區的守護神，其發源於廣東省潮州府揭陽縣霖田都一帶，當地有明山、巾山與獨山三座高山，三山國王傳說便是這三座高山的守護神，也可說是當地客家人的守護神，潮州客家人渡海來台也帶著三山國王信仰而來，鳳林地區的外省客家人幾乎都來自揭陽縣，但有趣的是，這群來自揭陽縣的外省客家人卻未帶來家鄉的守護神—三山國王，反而僅帶來大陸原鄉的傳統飲食文化—擂茶，其原因為何？尚待進一步研究與探討。請參見（張振岳 1994：203）。

其次，敬字亭也是日治移民的客家意像，敬字亭雖非客家人所獨有的建築物，但客家庄多分布在土地貧瘠之地，自古生活困苦，唯有靠讀書出仕才能改善生活環境，因此養成客家人「耕讀傳家」傳統，於是敬字風俗便成為客家人傳統特色之一（張志遠 2006：46-47）。鳳林地區也是一個文風鼎盛之地，該地出產為數眾多的國中、國小校長，素有「校長之鄉」的美名，民國九十三年（2004）興建「校長夢工場」之時，在館舍後方建有一座敬字亭，以展現客家人敬惜字紙、崇尚文風之美德，整座敬字亭皆以紅磚砌成，外型仿龍潭聖蹟亭的外觀，底部八卦，中央四方，頂端六角，具六合、四象及八卦的造型，將「晴耕雨讀」的歷史記憶鑄模在鳳林客家文化之中（張志遠 2006：197-198）。

最後，菸葉則是客家人移居鳳林後所形成的歷史記憶，「菸草文化」成為「客家文化」中的一環乃是經過一系列象徵化過程，洪馨蘭以高雄美濃地區為例，指出菸草文化被嵌入客家文化乃是經過勞動記憶的結果，這些勞動文化意涵包括：勞動空間、勞動人民、勞動成果、從勞動音樂逐漸轉變的農閒音樂、衣著服飾、農民文學、素人繪畫、描寫到美濃必定會提到的影視作品以及從菸作勞動過程所學習而來的勞動習慣、名詞等（洪馨蘭 2000a：233）。有關客家文化與菸葉經濟的研究，另可參見（洪馨蘭 1999；2000b：123-202）。鳳林大榮移民村一帶也曾栽種不少的菸草，日治移民也有栽種菸草的歷史記憶，故鳳林鎮公所重建鳳林鎮圖書館時，便以菸樓作為造型，紀錄著日治時期鳳林客家人栽種菸葉的歷史。

戰後客家移民的客家意像可從擂茶與花生酥糖二者觀察。戰後客家移民中其中一個移民類型為外省客家人移民，他們從廣東揭陽縣渡海來台，也把屬於揭陽當地的客家意像帶來台灣。民國三十八年（1949）左右從廣東陸豐、揭陽縣移入台灣的外省客

家人以擂茶為其日常生活的飲食（彭芊琪 2005：103），日治時期鳳林的客家移民並無飲用擂茶的習慣，但戰後來自廣東陸豐與揭陽縣的外省客家人至鳳林後，把大陸原鄉的擂茶飲食文化也帶來鳳林，²⁵ 興起一股喝擂茶的風潮，民國九十三年（2004）八月鳳林地區一群熱愛擂茶的客家人士成立「花蓮縣鳳林擂茶連誼協會」推廣擂茶，本文受訪個案彭先生（個案R4）便是這個擂茶聯誼協會的理事長。²⁶ 外省客家人帶來的另一項飲食文化為花生酥糖，如今花生酥糖已成為鳳林當地著名的特產之一，本文兩位受訪者劉先生（個案R3、個案R5）便是製作花生酥糖的業者，他們都是戰後從廣東省揭陽縣來台的外省客家人，選擇以花生酥糖為業乃是：「剛來到台灣的時候，覺得台灣的花生糖吃起來不習慣，於是便自己動手作起自己家鄉口味的花生酥糖。」（個案R5）在商業與觀光的推銷之下，花生酥糖自然而然成為戰後外省客家人的客家意象之一。

（三）社團活動

從鳳林客家移民參與當地社團活動的情形中，吾人也可概略了解日治與戰後移民在地化鑲嵌的差別。許多日治移民類型的第二代都從事教職與公務員工作，而這些訪談個案退休後，也多會投入該地社團活動之中，例如鄧先生（個案J1）除了參與世界客屬總會花蓮鳳林分會外，也因自己教職退休的緣故，而積極投入

²⁵ 受訪者彭先生（個案R4）指出鳳林地區的客家人僅有外省客家人才有食用擂茶，他提到：「以前只有大陸過來的懂得吃而已，他們看到茶葉黑黑擂成這樣，誰敢吃啊！」（個案R4）

²⁶ 戰後來台的外省客家人帶來擂茶飲食文化的情形不僅只見於鳳林地區，張振岳發現光復鄉大富村一帶的外省客家人也有食用擂茶的習慣。請參見（張振岳 1994：224-225）。

校長夢工場及客家文物館志工的行列；黃先生（個案J2）也是教職退休，他則期望能為退休老年者做些事情，故他加入鳳林鎮老人會並擔任總幹事一職。

戰後移民所參與的社團活動則不同，筆者訪談個案大多仍值壯年，故他們將全付心力置於工作上，能真正投入社團活動者並不多，僅有劉先生（個案R3）表示他曾是義消與義警的一員，戰後移民投入文教性社團活動者仍不多見。

（四）原鄉聯繫模式

日治移民者的原鄉是桃竹苗一帶，戰後移民者的原鄉較廣，西部、東部與大陸廣東揭陽都有。從訪談中可發現，日治移民者至今仍會派代表回西部祭祖，例如林先生（個案J5）便指出：

我們每年要回去掃墓，不是在這裡，所以以前我們東部的人，在這裡老死的話，很少在這裡作風水，都會把遺骸拿回去自己處理。尤其客家人很重視家族，所以說客家人有共同墓葬的習慣，所以現在很多外地人像外省人、閩南人他覺得我們客家人的制度很好，現在因為工業社會現在都是留散在外面的子孫，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見見面，他們以前沒有，他們發現我們客家人這種制度很好。現在也有慢慢有客家人在東部做風水，像我們就通通拿回西部去。（個案J5）

透過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動，不僅表達對祖先的緬懷之意，也依舊維持與原鄉親人的情感交流。

戰後西部與東部移民鳳林者也大多會回原鄉祭祖（個案R9），但戰後外省客家人來到台灣後，迫於兩岸情勢與路途遙遠等因素，鮮少有外省客家人回大陸祭祖，頂多是來台第一代對大

陸原鄉仍有感情，民國七十七年（1988）政府宣佈開放大陸探親後，興起一股返鄉祭祖掃墓的熱潮，但對來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而言，大陸親友似乎將金錢看得比親情還重，劉先生（個案R3）提到他父親返回大陸探親的經驗：

我父親是開放大陸探親的時候去，回去一趟將近花掉三百萬，我爸爸回去兩年我就發現不對，爲什麼？那些人不是要親情，是要錢，因為我老人家他手上有錢，他要給他的媽媽有什麼關係，那是他的問題，我們不會去在意這個問題。這兩年我祖母死了，大概音訊也斷了，那些人來還是一樣要錢而已。（個案R3）

鳳林外省客家人第一代逐漸凋零後，這群外省客家人與大陸原鄉的聯繫已逐漸產生鬆動的情況，許多來台第二代甚至不再返回大陸探親，因此外省客家人的原鄉聯繫將慢慢斷絕，鳳林對他們而言才是真正的故鄉。

六、結 論

從文獻資料可知今日鳳林地區的族群組合主要是源自於日治與戰後兩個時期的移民潮，大批客家人移入鳳林地區，使得鳳林從原住民為主的社會轉變成客家人為大宗的社會。

為何這群客家人選擇移居鳳林發展呢？從訪談資料可知，其移民原因可歸納為天然災害、戰亂、就業機會、求學等四項因素。這些移民者大多經由親友介紹而來到鳳林發展，在遷移過程中透過「社會資本」得到訊息、住宿與信任的協助，使得這群客家移民得以順利進入當地社會，進而在當地生根進入當地社會。

若將日治與戰後兩種移民類型進行比較，可發現：日治移民多是舉家遷移，且大多透過在鳳林親友的介紹而來，因當時尚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鳳林地區設有林田官營移民村（今日大榮里與北林里一帶），²⁷ 作為供日本農民在台拓墾發展之地，因此日治時期的客家移民對住所空間的選擇有限。

戰後移民來源較為多樣，此時客家移民主要有來自大陸、西部與東部等地，而舉家遷移情況不若日治時期多，且戰後客家移民來鳳林時間較短，故戰後客家移民者的家族規模大多較日治客家移民者的家族小，其所擔任的職業也較為多元，醫師、銀樓經營、販賣花生酥糖、算命均是戰後客家移民的職業。戰後日本人離開台灣，林田移民村便開放給台灣人居住，因此開始有戰後客家移民移入林田移民村生活。

日治與戰後移民者在地化的過程也有不同。日治移民者的第二代多從事農務或公教職工作；戰後移民者的職業較為多元，從事醫師、經營銀樓、從事花生酥糖批發等職業。

日治客家移民將西部客家意像如義民廟、敬字亭等根植於鳳林地方社會中；戰後外省客家人則將大陸原鄉的擂茶傳統帶來鳳林發揚。日治移民者社團參與與其職業有關，大多參與世界客屬總會、客家文物館等文教性的社團；戰後類型受訪者因大多仍未退休，因此有心力投入社團活動者並不多。在原鄉聯繫上，日治移民者的原鄉聯繫較密切，至今仍會親自或派代表返回西部原鄉祭祖掃墓；戰後移民者在原鄉聯繫上便顯得較淡薄許多，外省客家人定居鳳林後，僅移民第一代曾回大陸探親，移民第二代或第三代與大陸原鄉鮮少聯繫。

²⁷ 林田移民村設立於大正三年（1914），分為南岡、中野、北林三聚落。請參見（張素玢 2001：86）。

本文試圖藉由日治與戰後移民類型的比較突顯客家族群移入鳳林地區之特色，而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移入鳳林後是否融合成一個社會呢？從本文關於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在地化現象」的討論中，可發現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在職業選擇、強調的客家意象、參與社團活動、原鄉聯繫模式上均有差異，因此，鳳林地區的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依遷移歷史與原鄉情境的不同，對客家文化的詮釋也產生殊異的情形。換言之，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對客家文化有各自不同的認識與想像。

民國九十年（2001）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後，在各地推行多樣客家活動（例如義民祭、桐花祭等），此時看似相同實則充滿歧異的客家文化開始朝向兩條道路發展，一種為抗拒主流客家文化，建構屬於自己的客家文化，²⁸另一種則為受主流客家文化收編，自身的客家文化逐漸流失。鳳林地區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有著各自不同的原鄉背景、遷移過程等差異，因此他們在論述所謂的「客家文化」時出現各自表述的情形，故根據筆者初步觀察發現：基本上鳳林地區的日治與戰後的客家移民並未形成融合一體的情況。

往後鳳林地區的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究竟會逐漸變成一體的社會？抑或各自往開闢出不同客家文化道路發展？此非本文所能回答之問題，尚待另文討論。

²⁸ 例如施論靜發現詔安客家人面對一般大眾所熟知的「客家文化」時產生疑慮現象，藉著文化展演的場域，崙背與二崙的詔安客家人從開嘴獅的文化表演中重新塑造屬於他們的客家文化，這便屬於抗拒主流客家文化的例子。請參見（施論靜 2004）

附 錄

本研究受訪個案基本資料暨對照表

個案編號	J1	J2	J3	J4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出生年份	1925	1932	1929	1933
學歷	師院	花蓮師院	師院	花蓮高農
職業	退休教師	退休教師	退休校長	退休公務員
移民類型	日治	日治	日治	日治
遷移時間	1933	——	1926	約1920
遷移前居住地	苗栗三灣	桃園新屋	新竹關西	苗栗頭份
遷移原因	地震	其他	個人理想	——
他人的協助	伯父提供訊息	彭姓人家做長工	(1) 姑媽提供訊息 (2) 日本老闆提供 資金開店	饒永昌提供工作

個案編號	J5	J6	J7	J8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出生年份	1936	1956	1935	1938
學歷	高中	專科	師專	師範學校
職業	林務局退休員工	林務局員工	退休校長	退休教師
移民類型	日治	日治	日治	日治
遷移時間	1928	——	1915	約1931
遷移前居住地	苗栗頭份	苗栗頭份	新竹峨眉	新竹竹東
遷移原因	生活困苦	工作機會	生活困苦	生活困苦
他人的協助	糖場工作	林場工作	鄧阿秀介紹工作	糖場工作

個案編號	J9	R1	R2	R3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出生年份	1933	1933	1940	1956
學歷	師專	師院	大學	高中
職業	退休校長	退休校長	醫師	命理師
移民類型	日治	戰後	戰後	戰後
遷移時間	1935	1946	1973	1948

遷移前居住地	新竹北埔	苗栗三灣	桃園觀音	廣東階陽
遷移原因	苗栗大地震	求學	診所開業	大陸戰亂
他人的協助	(1) 張金榮提供訊息 (2) 謝祖旺提供工作	邱先生邀請	(1) 姑媽提供訊息 (2) 親戚提供開業資金	宗族長老提供住所

個案編號	R4	R5	R6	R7
性別	男	男	男	男
出生年份	1937	1946	1951	1966
學歷	國小	高職	——	專科
職業	農會退休員工	台電退休員工	鳳林夜市管理人	銀樓負責人
移民類型	戰後	戰後	戰後	戰後
遷移時間	1952	1948	1948	1963
遷移前居住地	花蓮光復	廣東階陽	廣東階陽	屏東竹田
遷移原因	光復糖場被收、換地	大陸戰亂	大陸戰亂	閩南老閩排擠、到鳳林開業
他人的協助	——	——	——	金榮豐百貨行老闆

個案編號	R8	R9
性別	男	男
出生年份	1936	1962
學歷	小學	花蓮高農
職業	林務紙業公司退休員工	自由業
移民類型	戰後	戰後
遷移時間	1945	1945
遷移前居住地	花蓮	花蓮
遷移原因	花蓮空襲	花蓮空襲
他人的協助	——	——

參考書目

- Bailey, Kenneth, 1993, 《社會研究方法論》。新店：學英文化。
- 王雯君, 2005, 〈客家邊界：客家意象的詮釋與重建〉。《東吳社會學報》18: 117-156。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1999, 《花蓮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興南新聞社調查部編, 1985, 《台灣人士鑑》。東京：湘南堂。
- 台灣總督府, 1999, 《昭和十年台灣震災誌》。台北：南天書局。
- 台灣總督府、台灣日日新報社合編, 1999,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台北：成文出版社。
- 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 2003, 《發現豐田—一個日本移民村的誕生與發展》。台北：文化建設委員會。
- 李宜憲, 2005, 〈大港口事件：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東台灣研究》10: 5-36。
- 李國祈, 1975, 〈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1875-1894)〉。《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12): 4-16。
- 沈葆楨, 1997, 《福建台灣奏摺》。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孟祥瀚, 1988, 《台灣東部拓墾與發展(1874-1945)》。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1991, 〈清代台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興大歷史學報》創刊號: 133-162。

- 孟祥瀚，2002，〈日治時期花蓮地區客家移民的分布〉。頁129-160，收錄於賴澤涵主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林彥亨，2003，《客家意象之形塑：台灣客家廣播的文化再現》。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聖欽，1998，〈日治時期花東縱谷中段地區的土地開發〉。頁239-277，收錄於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編，《守望東台灣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 花蓮縣文獻委員會編，1958，《花蓮縣志稿》。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 姜如珮，2004，《台灣電視中之客家意象：公視「客家新聞雜誌」之個案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姚誠，1999，《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花蓮：花蓮縣文化局。
- 施諭靜，2004，〈此客非彼客？文化知識建構的網絡行動〉。《文化研究月報》41。（網址：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41/journal_park328.htm）
- 洪馨蘭，1999，《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台北：唐山出版社。
- _____，2000a，〈客家、美濃、菸草文化之象徵性過程〉。頁209-258，收錄於徐正光主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歷史與社會經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_____，2000b，〈南部地區、美濃客家、原料菸葉之產經關係〉。頁123-202，收錄於張維安主編《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袁方主編，2002，《社會研究方法》。台北：五南出版社。

- 康培德，1999，《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板橋：稻香出版社。
- _____，2004，〈清代「後山」地理空間的論述與想像〉。《台大文史哲學報》61：299-318。
- 張永楨，1986，《清代台灣後山開發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志遠，2006，《台灣的敬字亭》。新店：遠足文化。
- 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文化中心。
- 張振岳，1994，《台灣後山風土誌》。台北：常民文化。
- 張素玠，2001，《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新店：國史館。
- 張維安、王雯君，2005，〈客家意象：解構「嫁夫莫嫁客家郎」〉。《思與言》43（2）：43-76。
- 許極燉，1996，《台灣近代發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
- 陳柔森主編，陳若雲、葉婉奇翻譯，1999，《走過土地認識人民：《台灣慣習記事》資料彙編I》。台北：原民文化。
- 陳鴻圖，2002，〈官營移民村與東台灣的水利開發（1909～1946）〉。《東台灣研究》7：135-163。
- _____，2004，〈從卑南大圳的興築看日治時期東台灣水利開發的特性〉。《台東文獻》9：86-105。
- _____，2005，〈「東台灣」歷史學研究的回顧（2001-2005）—以政府出版品為中心〉。《東台灣研究》10：111-129。
- 彭芊琪，2005a，《外省客家人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2005b，〈苗栗縣外省客家人與擂茶文化研究〉。《苗栗文獻》33：103-113。

- 馮建彰，2000，〈東部客家產經活動〉。頁204-276，收錄於張維安主編《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黃榮洛，1989，《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 黃學堂，2003，〈清代台東的客家人〉。《台東文獻》8：4-13。
- 黃應貴主編，1992，《見證與詮釋》。台北：正中書局。
- 黃蘭翔，1998，〈日本官營移民村建設目的與居民營運組織：以吉野、豐田、林田三村為例〉。頁213-238，收錄於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編，《守望東台灣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
- 廖正宏，1985，《人口遷移》。台北：三民書局。
- 劉還月，1998，《處處為客處處家-花東縱谷中的客家文化與歷史》。鳳林：鳳林鎮公所。
- _____，1999，《台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台北：常民文化。
- 潘文富等撰述，2005，《台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潘英，1992，《台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下）》。台北：自立晚報。
- 潘繼道，2001，〈清代大庄「舊人」台灣後山發展史〉。《台灣風物》51（1）：79-110。
- _____，2001，《清代台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稻香出版社。
- 鄭政誠，2005，《台灣大調查：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蘆州：博揚文化。
- 賴東明，n. d.，《鳳林史蹟考》。鳳林：未出版。
-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編，1998，《守望東台灣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

鍾書豪，2003，《花蓮地區的糖業發展（1899-2002）》。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淑敏，1986，〈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史聯雜誌》8：74-84。

梶原通好，1924，〈東部台灣の農業を論ず（一）〉。《台灣農事報》207。